



马来西亚公立大学招生体系的窘境和出路

华研智库研究报告

2026 年 9 月 1 日

引言

每个国家的公立高等教育招生体系，都反映着该国在精英主义、公平价值、入学机会和社会流动等方面的整体哲学。总体而言，这些体系可大致分为两类：一是“集中式招生”，学生透过单一机制同时申请所有大学；二是“分散式招生”，学生须自行应对多个不同渠道或机构的申请流程。

马来西亚公立大学属于“集中式招生”，所有本地申请者都须透过 UPU (Unit Pusat Universiti, 大学中心单位) 这个单一门户提交申请志愿，并由同一个 UPU 机制统一分配公立大学学额，这与中国透过全国统一系统依高考成绩分发录取的方式，同属“集中式招生”。但这两者存在重要差异，中国以全国高考作为几乎唯一的入学依据，标准高度统一，而马来西亚则允许多种大学预科资格：包括 STPM (学制约 18 个月)、Matrikulasi (大学预科班，学制 1 至 2 年) 以及 ASASI (大学基础课程，学制 1 年) 并行。申请者持不同预科资格，但经由同一个 UPU 系统提出申请，系统再依各别资格进行评审与录取。

理论上，多元渠道应让学生量力而行、量才而估；但在我国，这套系统长期和种族及土著优惠政策捆绑，衍生诸多争议。此报告简要探讨教育不公和直接招生现象，以呈现公立大学生对录取制度的看法，并提出政策建议。

公立大学生怎么看？

1971 年以前，我国公立大学录取纯粹依据高等教育证书 (Higher School Certificate) 成绩。1969 年五一三事件后，政府推行新经济政策和“土著 55：非土著 45”的大学教育固打制，并陆续设立 UPU 统一招生处 (1972 年)、公立大学基础课程 (1976 年)、大学预科班 (1998 年) 等管道，以扶助土著升学。



固打制虽在 2003 年改为绩效制，但预科班和基础课程内容较浅、几乎专属土著参与，和 STPM 严谨的学术水平形成“苹果与橙”的不公平比较，此乃学界的长期共识。由于近年公立大学财政日益吃紧，多所大学自 2017 年起相继开设高收费的直接招生通道，被批评为变相“侧门”，进一步引发教育资源分配的争议。

在 UPU 系统里，存在大学入学三轨制的体制，预科班、基础课程和 STPM 三种课程的 CGPA 被直接比较，以筛选学生入读大学本科课程。尽管政府一再强调三者的可比性，声称该制度是公平的，但大学教师普遍意识到，预科班和基础课程是简化后的教学纲要，难以让学生具备足够的学力应付大学课程。而 STPM 具备严谨的、和 A 水平相等的较高学术水平。

让问题加剧复杂的是，预科班设有“90%土著：10%非土著”的政策，导致入读的非土著几乎全是 SPM 全 A（特优）高材生，而土著只需数科特优即可入学，进一步拉大公立大学内族群间的学术鸿沟。另外，非土著毕业生普遍难以获得公共服务局（JPA）奖学金，该局的数据至今仍不公开，民间和各大社媒留言区普遍相信存在偏袒土著的做法。

除了前述的三轨制，后来又加入直接招生这个通道，形成四轨的局面。此外，越来越多土著通过文凭课程（Diploma）入学，导致 UPU 长期纠缠于种族不满的争议。遗憾的是，UPU 系统操作一直都是不透明的，公众无从知晓各渠道的录取情况。

为了解公立大学学生对“教育资源分配公平性”的观感，本研究访问了全国 12 个州的 59 名公立大学学生（占 93%）与近五年内的毕业生（占 7%），包含华巫印三大族群和东马土著（表 1）。

表 1：受访学生的入学途径

	马来裔 (n = 24)	华裔 (n = 28)	印裔 (n = 4)	东马土著 (n = 3)	总数
预科班（Matrikulasi）	7	5	1	2	15
STPM	2	19	1	—	22
基础课程（ASASI / University Foundation）	4	—	1	—	5
直接招生（Direct Intake）	—	1	1	—	2
Diploma	11	3	—	1	16



必须说明的是，由于调查样本量小，统计代表性有限，因此不足以代表全国公立大学生群体的整体意见。以下呈现的仅是初步观察和趋势线索，用意在于为未来更大规模、更具代表性的调查研究提供方向、假设和参照基础。

另外，由于东马土著和印裔受访者分别只有 3 和 4 位，故此分析主要聚焦比较“华印裔非土著”和“马来裔土著”的反馈和看法。

在升学途径方面，华印裔受访者绝大多数透过 STPM 升学，马来裔则分布在文凭课程、大学预科班和大学基础课程之间。其中华印裔和马来裔受访者的入学成绩属于高分段者（CGPA 3.75 或以上），其百分比分别是 25% 和 8.3%。来自 B40 家庭的华印裔和马来裔受访者，分别为 59.4% 和 58.3%。

此调查设计了四个与主题相关的问题：（1）直接招生之公平性；（2）升学途径的保留；（3）入学系统透明度；和（4）社会融合。其余问题也包含针对“学术绩效差异”和“经济可及性”相关议题（详见表 2），以及要求受访者提供改善政策的开放式问题。

表 2：公立大学入学途径的公平性感知

问题（维度）	非常赞同和赞同的 百分比（%）#			中立的 百分比（%）#			非常不赞同和不赞同的 百分比（%）#		
	整体 (n = 59)	马来裔 (n = 24)	华 (28) 印 (4) 裔 (n = 32)	整体 (n = 59)	马来裔 (n = 24)	华 (28) 印 (4) 裔 (n = 32)	整体 (n = 59)	马来裔 (n = 24)	华 (28) 印 (4) 裔 (n = 32)
STPM/预科班/大学基础课程比直接招生更难获得同一课程的机会（学术绩效）	57.6%	41.7%	71.9%	20.3%	33.3%	12.5%	22.0%	25.0%	15.6%
在小组项目中注意到不同入学渠道学生在学业表现上存在差异（学术绩效）	59.3%	58.3%	59.4%	30.5%	25.0%	34.4%	10.2%	16.7%	6.2%
高昂的直接招生费用使高收入家庭学生在竞争激烈的课程中占据优势（经济可及性）	67.8%	58.3%	71.9%	20.3%	20.8%	21.9%	11.9%	20.8%	6.2%
曾通过直接招生获得目标课程的录取机会，但家庭无力承担相关费用（经济可及性）	28.2%	25.0%	29.4%	43.6%	40.0%	52.9%	28.2%	35.0%	17.6%
直接招生是公立大学弥合资金缺口的重要机制（经济可及性）	54.5%	60.9%	48.3%	38.2%	34.8%	41.4%	7.3%	4.3%	10.3%
直接招生配额减少了符合资格的 B40/M40 学生通过 UPU 可获得的学额（机会平等）	65.5%	62.5%	67.7%	25.9%	25.0%	25.8%	8.6%	12.5%	6.5%
大学选拔过程是透明且没有偏见的（机会平等）	45.8%	50.0%	40.6%	35.6%	41.7%	31.2%	18.6%	8.3%	28.1%



问题（维度）	非常赞同和赞同的 百分比（%）#			中立的 百分比（%）#			非常不赞同和不赞同的 百分比（%）#		
	整体 (n = 59)	马来裔 (n = 24)	华 (28) 印 (4) 裔 (n = 32)	整体 (n = 59)	马来裔 (n = 24)	华 (28) 印 (4) 裔 (n = 32)	整体 (n = 59)	马来裔 (n = 24)	华 (28) 印 (4) 裔 (n = 32)
预科班、STPM 和大学基础课程必须继续作为主要入学渠道，以保障土著的教育机会（机会平等）	<u>66.1%</u>	79.2%	56.2%	<u>25.4%</u>	16.7%	34.4%	<u>8.5%</u>	4.2%	9.4%
普遍存在对直接招生学生学术质量的负面看法（社会融合）	<u>27.1%</u>	16.7%	34.4%	<u>50.8%</u>	58.3%	43.8%	<u>22.0%</u>	25.0%	21.9%
来自不同入学渠道的学生倾向于在社交和学业上自我隔离（社会融合）	<u>39.0%</u>	41.7%	34.4%	<u>32.2%</u>	25.0%	37.5%	<u>28.8%</u>	33.3%	28.1%

基于有效回答的百分比（不包括“不适用”）。

主题一：受访者普遍认同直接招生在某种程度上，挤压了中低收入家庭学生透过正规渠道升学的机会，是本调查中跨族群共识度最高的议题之一（65.5%）。不过，两个群体关注的出发点并不相同，马来裔更多从保障土著教育权益角度出发，华印裔学生则更强调能力至上和配额公平。

主题二：在“预科班、STPM 与基础课程应继续作为保障土著教育机会的主要渠道”这一问题上，马来裔学生的支持度（79.2%）明显高于华印裔学生（56.2%），是族群间意见分歧最大的议题。此议题和族群身份绑在一起，可能是因为预科班九成学额保留给土著学生，基础课程也以土著生为主。

主题三：“招生过程公开透明、没有偏见”是受访者认同度最低的一项，只有 45.8% 受访者表示认同。华印裔学生的怀疑态度尤其明显（40.6%），马来裔则是 50.0%。不少受访者反映，STPM 考生经常被拿来和预科班背景的申请者比较，但校方始终未清楚说明评分与取舍的标准。

主题四：多数受访者对“直接招生渠道的学术水平较差”这类标签持谨慎、中立的态度（马来裔 58.3%，华印裔 43.8%）；但在被问及不同入学渠道的学生是否倾向“自成一群”、缺乏交流时，有相当比例受访者给予肯定，尤其马来裔的同意率有 41.7%。



除此之外，在“高昂的直接招生學費，使富裕學生具優勢”的問題上，華印裔學生同意率（71.9%）顯著高於馬來人（58.3%）。這可能是因為華印裔多通過 STPM 申請，也大多來自 B40 群體，對經濟障礙更敏感。

在開放式回答的問題中，有關“如果能改變公立大學錄取過程中的一件事，你會做甚麼？”時，華印裔受訪者普遍呼吁統一 STPM、預科班與基礎課程之間的評分標準。馬來裔受訪者更多是提出應納入課外活動、家庭背景等更全面的評估方式。兩者的共同點都是希望錄取制度能更全面、更透明。

多渠道招生制度的省思

我國公立大學的“三軌招生制”長期影響學生對公平性的認知和學力程度。此調查中有 60.0% 受訪者注意到，來自不同入學渠道的同學，在學業表現落差的情況。

學界普遍認為招生程序對大學學業成就具有較高關聯度和預測性，能有效區分高潛力和可能輟學的学生，因此應避免學術水平過低者影響大學整體質量。匈牙利的布達佩斯大學的科技與經濟團隊和澳洲塔斯馬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Tasmania）分別在 2021 年和 2018 年提出的報告都顯示，集中式入學考試是較有效的預測指標。儘管設立不同路徑的初衷是擴大受教育機會，但經歷更嚴謹的標準化考試的學生，其表現往往優於來自銜接課程或內部課程的學生。

無論如何，耶魯大學 Cowles Foundation 在 2024 年的研究報告指出，集中式“精英”的選拔體系雖提升效能，却可能使缺乏備考資源的農村或低收入家庭學生處於不利地位。這是集中式招生制度必須正視和解決的兩難問題。從本次調查中族群分歧的現象來看，我國任何招生制度的改革，恐怕都無法和族群政策脫鉤討論。

在直接招生方面，有 67.8% 受訪者認為“高昂學費讓富裕學生占優勢”，也有 52% 馬來裔受訪者表示，自己雖符合直接招生錄取門檻，却因經濟能力有限而無法負擔相關費用。這項原意用來填補大學財政缺口的機制，可能無意間排除了原欲保護的貧困馬來學生，反在族群內部製造階級鴻溝。



关于招生透明度，受访者对公立大学选拔过程是否“透明且无偏见”的认同度，是所有议题中最低的（45.8%）；这反映出申请者对招生“黑箱作业”的不信任度相当普遍。若缺乏公开、以证据为基础的招生机制，大学学历的公信力恐怕也将受到质疑。华印裔受访者有较高的“不赞成”比率（28.1%），对比马来裔是 8.3%，也可能反映他们的切身经历：STPM 申请者被拿来和预科班背景竞争者比较，而 UPU 却没有说明如何评估不同学术背景，或者公开不同渠道申请者的成绩比较。

在社会融合方面，尽管多数受访者对相关负面标签持谨慎的中立态度，但相当比例受访者（尤其马来裔）还是观察到，不同入学渠道学生之间存在自我区隔的现象。这与部分国际研究，例如包括英国倫敦大都會大學（London Metropolitan University）2013 年的研究所提出的，“表面多元、实质隔离”现象相似。无论如何，其中的因果机制需要进一步更大规模的质性研究。

另外，受访者对“社会融合”问题持較高的中立性，可能源于他们避免对敏感问题做出明确判断，在表面上对多样性持政治正确态度，避免承认种族差异、刻意避开可能引起争端的种族语言，以维持一种“文明融合的假象”。

六项政策建议

建议一：建立“统一学术能力换算框架”。在政治现实上，完全废除预科班和公立大学基础课程，目前不具備條件；但让三种难易度不一的學歷在同一标准下竞争，也有失公平。目前可考虑设立全国性核心能力测试（涵盖批判思维、语文写作、数理逻辑等），作为三种课程成绩之间的校准机制。也可考虑将各课程 CGPA 换算为可比较的“标准化入学分数”，形成“多元路径+共同标尺”的混合模式。

建议二：从种族配额转向“经济需求指数”。保留预科班与基础课程作为保护性渠道，但录取标准转向社会经济条件，以家庭综合收入、城乡差距、父母教育程度等因素，不分族群优先照顾弱势申请者，借此减轻其他族群的受剥夺感。



建议三：推行“多维度录取评估”。降低单一考试成绩的权重，纳入面试、课外活动、领导力表现、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等多元指标。让考试成绩较弱、但综合能力突出的学生（尤其是乡区与低收入家庭学生）获得更公平的竞争机会。

建议四：提高招生透明度。公开各入学渠道的平均录取分数、面试评分标准、各科系最低录取门槛、录取率，以及历年不同渠道学生入学后首年学业表现等数据。这是政府过去数十年一直回避、却是重建公众信任最直接且有效的做法。

建议五：改革直接招生制度。直接招生学费高昂且缺乏透明度，容易沦为“有钱人的后门”。建议逐步取消本地学生的直接招生名额，将此学额用于招收国际学生，同时公开收费标准、录取人数与背景构成，并设定不超过总录取名额一成的上限，避免挤压主要渠道名额。

建议六：建立校园社会融合机制。大一新生的宿舍安排、小组作业和迎新活动，强制混合不同入学渠道背景的学生，并设计有组织的互动、需要共同完成的任务。高教部也可建立“校园融合指数”、设立跨文化对话必修课程，并追踪各校学生跨渠道互动频率与归属感。

结论

以上建议虽然是基于小规模探索性调查的初步观察所得，且受访者的背景组成、科系分布及招募方式，也可能限制结果的普遍性，但整体而言，我国各族群公立大学生在追求公平、透明与升学机会方面，其实拥有相当一致的基本诉求；分歧主要在于如何理解这些诉求，以及应优先保留哪些制度安排，尤其体现在大学预科资格的标准化、透明选拔标准、全面评估体系与配额改革等具体议题上。

这些反馈背后，有着同一个基本立场：入学途径本身，不应从结构上预先决定学生能否获得大学教育的机会，而表面上看似程序公平的 UPU 招生制度，也在无形中延续着结构性的不平等。更严重的是，不同的入学“标签”，多年来已在校园内筑起一道道无形的族群隔阂高墙。传统的保护性政策和现代的学术精英主义之间的冲突和张力，透过这次调查清晰浮现。而意在纾解大学财政压力的“直接招生”渠道，则让不少学生感受到公平性和凝聚力正在流失。



我国多通道招生体系固然提供了灵活性与广泛的入学机会，但不同渠道的生源构成并非中立開放、学术标准也缺乏统一时，结构性不平等风险便会出现。要推动大学招生制度改革，恐怕必须同时正视族群关系的张力、入学标准的一致性，以及数据透明度这三大核心课题。而“STPM 学术水平高于其他两者”的观察和论述，雖有待严谨的专业学术比较来验证，但改革最大的挑战，还是来自于种族政治因素的干扰，这是我国公立大学教育招生体系当下所面临的十字路口。